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36

吴敬琏 主编

吴敬琏

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未来的前景

许成钢

用中国体制破解“中国之谜”

邹至庄

从理论研究到社会变革

苏珊·阿西

一个经济学家的学以致用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罗纳德·吉尔森 屈尔蒂斯·米约普

主权财富基金与公司治理

黄海洲

理解次贷危机

R.拉·波塔 F.洛佩兹·德-西拉内斯 A.施莱弗

法律起源的经济后果

安奴贾·乌兹 卡尔·达尔曼

印度如何推进包容性创新

汪德华 白重恩

政府为什么要干预医疗部门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36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第 36 辑/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086-1174-7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8498 号

比较·第三十六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十三区 35 号楼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174-7/F · 134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4264824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卷首语

2008年可能是中国经济的转折年。一方面，由于次贷危机不利影响的显现，全球经济正处于下行风险之中，同时国内又面临着资产价格大幅调整、通货膨胀恶化的风险，可谓内外交困，对经济稳定政策构成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改革收益不断递减，利益格局固化，整体改革难以推进的阶段。因此，从体制改革和政策两个层面冷静地思考中国经济的“光与影、强与弱”，显得比以往更有必要。

主编吴敬琏教授回顾了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思想观念不断突破，政策和制度不断调整、改进的过程。中国的经济随着这个过程日益发展壮大。但是，这个在改革中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政府多方面地控制经济发展，国有经济仍在一些重要部门占垄断地位，使市场难以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寻租条件的广泛存在滋生了腐败。因此，“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而“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尽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还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的正常运作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

许成钢教授的《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制与中国改革》一文是根据我们对他的两次采访及他的相关学术论文整理而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学公认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存在明显落差，十几年来一直被主流经济学界视为“中国之谜”。而在许成钢教授看来，这个“谜”可以用中国的基本体制——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制来解释。这个以“大而全、小而全”为主要特征，以GDP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地区竞争体制，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符合当时条件的“激励相容”制度。如果从

“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个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来看，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体制与之并不矛盾。那么，时至今日，这个制度是否仍然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随着中国从落后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任务也从经济增长这个单一目标转变为经济发展、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等多重目标。面对多重目标，地区竞争体制所产生的过分注重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将导致各种更加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将重点放在这一基本体制上。

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经济学成为了一门显学，当前经济学家们的影响面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凡是能和经济学家沾点边的问题，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各类媒体和机构里都有各种经济学家的身影。悖论的是，相比于改革开放的前期，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却似乎在走下坡路。本辑“视界”栏目的两篇文章也许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种悖论现象背后的某些原因。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曾参与过海峡两岸许多重大的政策咨询项目。他的《从理论研究到社会变革》一文结合自己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政策咨询实践，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作者指出，学术上的前沿成果，本身不足以直接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家并不天然具备合适的政策建议能力，正如微观经济学家不能随便担任大公司的CEO一样。面对实际的经济问题，学者们首先要有准确判断病因的能力；然后是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例如中国大陆当年推出的双轨制就是极佳的创新；第三是发表具体建议时需要注意的要点，包括政治上的可行性、政府官员的合作态度、良好的行动时机、开放和谦虚的心态等。经济学家们尤其要善于把研究成果传达给那些没有专业理论背景的聪明人。

《一个经济学家的学以致用》是哈佛大学教授、2007年克拉克奖得主苏珊·阿西对其研究领域的概括和总结。克拉克奖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阿西教授是目前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在这份简要的总结中，阿西教授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学研究对经济政策的重要影响。例如，她根据自己对拍卖理论的研究，为美国林业局设计拍卖机制，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局设计放松管制方案和定价政策，影响了该省大约四分之一的经济活动。她说：“经济学家的最终目的是做出预测或推断，并对可供选择的公共政策做出评价。经济学研究中最实用的部分就是可以被政策制定者直接利用的各种经济分析。”从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深入、扎实的研究。

“前沿”栏目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根据诺贝尔奖颁奖演说写成的《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菲尔普斯教授认为，20世纪后半叶，现代经济已在大多数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于程序化的传统经济，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便是内生变化的可行性：现代化带来了无数的制度安排，如扩大的产权、公司法以及金融制度等等。虽然传统经济已经转变为现代经济，但传统经济学并未向现代经济学转变。为了建立能够解释现代经济现象的经济学模型，菲尔普斯教授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对人们的预期、货币政策、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增长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和开创性的研究，文章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菲尔普斯教授还针对现代经济提出了“好的经济”的概念，对“好的经济”的界定取决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但究其本质，一个“好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活力，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不仅如此，它还必保持公正，以确保经济体有足够的包容性”。

主权财富基金和次贷危机无疑是2007年和2008年国内国际金融市场最热门的话题。在“金融评论”栏目中我们为读者各选取了一篇文章。《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司治理》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罗纳德·吉尔森和屈尔蒂斯·米约普的最新工作论文，两位教授长期致力于公司治理研究。主权财富基金在西方国家引起了诸多争论，一个主流观点是，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将威胁被投资国的安全，因此应予以严厉监管。作者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引起的争论反映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主权财富基金是有利于资金循环的正常商业活动，只要对之采取合适的监管措施，就可以加以有效的利用。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基于“最小干预主义原则”的暂停投票权规则，以区分主权投资基金出于政治考虑的战略投资和源于经济考虑的财务投资。这一规则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种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根本问题，但却能有效地处理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次贷危机的影响似乎正在逐渐显现和扩大，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次危机及其影响，未来将面临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曾在IMF和巴克莱等国际金融机构任职、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的黄海洲在《理解次贷危机》一文中的分析也许能给我们提供参考。作者解析了次贷危机引发的原因，着重探讨了次贷危机的影响，认为次贷危机会形成三波冲击，对投资银行的第一波冲击已经过去，对美国实体经济的第二波冲击正在发生，虽没有致命的杀伤力，但市场波动在所难免，对商业银行的第三波冲击可能

会在近期发生。美国经济基本上将进入了一个相对高通胀、低增长、实际利率为负的新时代。对于美国政府干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各种争论，黄海洲认为：“在危机中，处理手段必须果断。无休止地纠缠政策和概念只会贻误战机，于事无补。”

大约十年前，哈佛大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等人发表了两篇分析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及其经济后果的论文，掀起了法和经济学研究的新热潮，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就法律起源对法律、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要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不同法律起源的经济后果》一文是施莱弗等人的最新研究结果。文章总结了有关法律起源重要这一论点的经验证据，力图对这些经验证据给出一致性的解释，同时还回应了针对法律起源重要论提出的批评意见。作者自信地指出，至少从现有的知识来看，法律起源论有四个命题是正确的：第一，国家间的法律规则和监管制度呈现系统性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被衡量并量化；第二，法律规则和监管制度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法律起源来解释；第三，形成法律传统的历史差异（主要是大陆法和普通法）可以很好地解释法律规则的不同；第四，能够被度量的法律规则的差异，对经济和社会有重要影响。作者认为，法律起源论为一国的制度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导意义，“改革应当集中设计适宜的制度，应该以与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传统相容的方式，去寻求专制和无序之间的最优权衡。在某些情况下，改革的方向仅仅是简单地减少政府干预。经济不发达和特定的法律传统，都不是对市场准入进行过度管制的正当理由，因此，从效率的角度讲，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是没有异议的”。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得不分两辑刊登本文。

印度的创新和印度的IT一样不容小觑。《印度如何促进包容性创新》摘自即将由我们出版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释放印度的创新》。世界银行的两位高级经济学家安奴贾·乌兹和卡尔·达尔曼详细介绍了印度为将创新惠及穷人所推行的主要机制，包括为正规部门从事有利于穷人的早期科技研发及商业化创造激励，例如为公共研发机构、大学、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全球扶贫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更优惠的配套补助；促进并推广基层创新，为创新的价值增值、商业化、融资创造条件，同时加强有利于穷人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支持各种创新人群和创新市场帮助非正规部门吸收知识，推动这些部门的创新。作者在文中提供了十多个专栏，使我们得以一窥印度蓬勃发展的创新活动。

虽然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但最近几年的现实表明，中国减贫的速率

正在下降，甚至出现了逆转，中国的不平等也在加剧，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在《城市化和中国的减贫与不平等》一文中，联合国发展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万广华从贫困—增长—不平等三角出发，分析了中国不平等的现状和主要原因，它对经济增长和减贫前景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不平等快速上升是导致减贫速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中国的不平等构成中，城乡不平等占到了70%。因此解决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不管是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都不是根本的对策，一个必然和长期的解决办法是城市化。

在“比较制度分析”栏目中，我们安排了两篇文章，探讨政府职能这个看似老生常谈，实则牵涉中国经济改革全局的话题。《OECD 国家监管改革与监管治理原则》全面介绍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OECD提出的监管改革原则和监管决策指南，这些原则和指南主要涉及监管体制设计、监管机构的设立以及监管工具的选择等领域，其目的是为了改进其成员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和绩效，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和转型。白重恩和汪德华的《政府为什么要干预医疗部门？》则从理论和国际经验两个角度分析了政府对医疗部门的干预。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医疗部门的主要动机不是解决市场失灵，而是再分配，以保证医疗服务的平等可及，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但是，政府也应该努力采取有效率的干预方式，以避免政府失灵问题。由于医疗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严重，需要在微观机制上进行创新，以寻找更有效率的干预方式。

本辑的“比较之窗”尝试开辟一个新的窗口，从非经济的视角探讨相关国家的社会面貌。因此，我们选择了一篇相当社会学的论文《富有民主国家可量化的社会健康与大众宗教虔诚、世俗主义的跨国相关性》。作者格里高利·保罗是自由作家兼古生物学家，他利用大量数据对发达国家的宗教虔诚度和社会健康状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方面，高度世俗化民主国家的社会失调比例一直不高，也就是说社会比较健康，而支持宗教、反进化论的美国则表现糟糕。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美国。

目 录

Contents

第三十六辑

- 1 建设现代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未来的前景 吴敬琏
Building a Modern China: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Their Prospects *by Wu Jinglian*
- 7 政治集权下的地方分权与中国改革 许成钢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by Chenggang Xu

23 视界 Horizons

- 24 从理论研究到社会变革 邹至庄
From Research to Social Change *by Gregory C Chow*
- 34 一个经济学家的学以致用 苏珊·阿西
Susan Athey's Research: A (Somewhat) Less Technical Introduction
by Susan Athey

- 51 前沿 Guide
- 52 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Macroeconomics for Modern Economy *by Edmund Phelps*
- 75 金融评论 Financial Review
- 76 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司治理 罗纳德·吉尔森 屈尔蒂斯·米约普
Sovereign Wealth Fund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 Minimalist
Response to the New Merchantilism
by Ronald J. Gilson and Curtis J. Milhaupt
- 98 理解次贷危机 黄海洲
Understanding the Subprime Crisis *by Huang Haizhou*
- 109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10 不同法律起源的经济后果
R. 拉·波塔 F. 洛佩兹·德-西拉内斯 A. 施莱弗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egal Origins
by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 135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
- 136 印度如何推进包容性创新 安奴贾·乌兹 卡尔·达尔曼
Promoting Inclusive Innovation *by Anuja Utz and Carl Dahlman*

159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160 城市化与中国的减贫和不平等

万广华

The Poverty-Growth-Inequality Triangle: Is High Growth Enough for Poverty Reduction?

by Wan Guanghua

173 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174 OECD国家监管改革与监管治理原则

OECD

Regulation Reform and Governance Principle In OECD Countries

by OECD

190 政府为什么要干预医疗部门?

汪德华 白重恩

Why Should Government Intervene Health-Care Sector?

by Wang Dehua and Chong-en Bai

203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204 富有民主国家可量化的社会健康与大众宗教虔诚、世俗主义的跨国相关性: 一个初步考察

格里高利·保罗

Cross-National Correlations of Quantifiable Societal Health with Popular Religiosity and Secularism in the Prosperous Democracies: A First Look

by Gregory S. Paul

建设现代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未来的前景

吴敬琏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开始的。

1. 救亡图存的努力：“摸着石头过河”（1978 ~ 1983 年）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希望借助于这一体制快速地把中国建设为一个富强的国家。50 年代后期，把这一体制推到了极端。结果是 1960 ~ 1962 年的大饥荒，饿死了 3 000 多万人。而在 1966 ~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巨大的社会灾难使绝大多数人对原有的体制和政策感到绝望，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迫害之苦，不仅党政高级干部认为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都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求得生路，当时，只能靠变革来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成为共识。

在开始的时期，中国领导并没有为自己设定改革的目标模式，而是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不管是什么样的办法，只要能够恢复和发展经济，都拿来救急。当时人们从多年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思想活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中国政府也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到英、美、法、日、

* 本文基于吴敬琏教授 2008 年 4 月在日本东京的一次学术演讲，演讲主题是“市场原理与中国经济”。

德各国去考察取经,学习它们发展经济的办法。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命令经济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形成了往后对中国经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几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

(1) 顺应农民的要求,在土地仍属村集体公有的情况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农场。

(2) 行政性分权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将中央政府拥有的一部分资源配置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扩大地方政府配置资源和取得收入的决策权力。古典型计划经济的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其组织结构类似于一个单一型 (Unitary - Form) 的企业。1980年中国进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省、地、县等地区成为具有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中国经济也由一个单一的系统转变为包含许多独立子系统的“多部门系统” (Multi - Division Form System)。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获得了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权力之后,有动力为本地区进行市场创业活动的人士提供保护和支持,通过扩大大地区的经济总量来提高地方政府和官员个人的收益。

(3) 生产资料分配和定价的“双轨制”。在集中计划经济时期,物质资源和资本资源全部由国家拥有,通过行政指令进行分配,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放权让利”改革,中国政府允许获得部分生产和销售自主权的国有企业按照“议价”自行销售超计划生产的产品。于是,物资分配和产品定价的“第二轨道”——市场轨道事实上被开辟出来。1985年,政府把“双轨制”确立为正式的制度,而把国有企业能够从计划调拨获得的物资数量固定在1983年的水平上。在“双轨制”下,私人企业可以通过市场轨来购买生产物资和销售产品,从而具备了从事市场化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

第三种制度安排是建立经济特区。早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1972年,中国已经开始改变闭关自守的做法,转向与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种经贸关系发展得很快,并且正式宣布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学习和引进外国技术,欢迎外资,特别是港澳台资本来中国大陆办企业。1980年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接着建立深圳等四个“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创造出来的适宜经济环境,使民营经济得以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1981年,中国私营企业的数量仅仅为183万户,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1171万户,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9%。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

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飞速增长。不过，由于政府在所有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造成了广泛的寻租可能性，使腐败得以滋生。

2.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逐步明确（1984～1993 年）

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使经济上轨道。相反，由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并存，带来了许多冲突和混乱。于是，就提出了一个“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这一重大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探索大致形成了四种改革的目标模式：（1）改良的苏联模式；（2）建立在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两种模式的影响力逐渐消退，后两种模式占了上风；其中，第三种模式为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所钟爱，第四种模式则为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知识分子所向往。

- 1984 年，在主张后两种模式的人的合作努力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确定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

- 1985 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明确这一经济体系是由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个部分组成。

-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应该说，此时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大体明确。

- 1986 年，中国政府曾经决定从 1987 年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期在 90 年代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邓小平在 1986 年再次启动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改革，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没能够进行下去。

- 只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种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才得以重新开始。

3. 新体制的建立及其缺陷 (1994 年至今)

根据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推进了经济改革，包括：

- 从 1994 年开始的财税体制、银行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包括“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活动。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
-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根据中共“十五大”决定进行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促进私人经济发展的运动。

经过以上这些努力，在世纪之交，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出现，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目前约占经济总量的 3/5，沿海地区则更高一些）。

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993 年至今的 15 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 10% 的高速成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现在中国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体。

但在另一方面，这个在改革中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缺陷。它的主要表现，是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国有经济在一些重要部门中处于垄断地位，使市场难于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由于寻租条件的广泛存在而促进了腐败的滋生。

从一开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人把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或者东亚国家在发展早期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做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甚至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受到削弱；或者极力扭曲改革，以便扩大寻租，获取更多的财富。

这样，改革开放 30 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商品价格开放，商品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当正确的改革决定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或者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时，就会造成腐败的蔓延，

引起大众的不满。

改革进行到中途，这种阻碍改革的情况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它使一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说，“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改到了最大的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就显得步履维艰，甚至在一些领域中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

除经济改革迟滞之外，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部分官员滥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强化对工程立项、股票上市等的审批等等，这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由此获得暴利。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滞后。邓小平在 1980 年和 1986 年两次发动政治改革都没能够进行下去。1997 年中共“十五大”重提法治建设，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这些改革都进度缓慢。这对于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是极其不利的。对于“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由于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使得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抢手的商品，买官卖官的现象流行起来。

4. 出路和前景

如前所述，近年来变得严重起来的腐败现象本来是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然而某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却对造成当前社会中这些恶劣现象的原因做出歪曲真相的解释，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都是由改革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所误导，采取市场取向和对外开放的方针造成的，由此引发了 2004~2006 年期间进行的改革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把某些弱势群体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腐败不公现象的正当不满，引向错误的方向，鼓动摒弃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旗帜，重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党政领导的态度是明确的。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这份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在这以前，胡锦涛主席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已经明确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现在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新思想。我希望在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得到推进。

在我看来，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是从宏观到微观，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还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的正常运作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缺乏宪政的传统，实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